

为挽救『神州陆沉』奋斗终身——革命先驱李大钊

□ 单伟

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中华民国有名无实的现状，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进行抗争。

李大钊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当时就读的学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他认为，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学业微不足道。他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李大钊奋不顾身、英勇战斗。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同当时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李大钊曾一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他在实践中感到，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宣传的理性王国，并不能保证正义、平等、人权的实现，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更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坚信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接受了他认为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的觉悟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运动中和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这篇文章长达26万多字，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该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并积极付诸行动。正是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阶级。这一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在奉系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毫不畏惧，考虑到北方区委人少，工作离不开，便继续领导着北方党的工作和革命活动。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敌人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索性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没有泄露任何党的秘密，没有说一句有损于革命的话。在《狱中自述》中，他自豪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生死攸关时刻，李大钊念念不忘保存革命实力。为保护同时被捕的革命青年，李大钊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危难中，表现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入狱，但李大钊以党的事业为重，强忍心中对她们的爱怜，“在狱中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李大钊和家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他非常沉着，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使他充满着勇气和力量。1927年4月28日上午，奉系军阀操控的安国军总司令部等组建特别法庭，对李大钊案件进行“军法会审”，决定对李大钊等判决绞刑，立即执行。从当时的新闻报道看，李大钊是当日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英勇就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牺牲时尚不到38岁。

李大钊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殒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摘自2019年第8期《旗帜》）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由来

□ 华汝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为中国青年提供了直接的斗争经验，并锻造了一批进步分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和人员准备。

中国的这场运动，也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北京，与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李大钊会晤，试图与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李大钊的介绍下，维经斯基等人继而赶往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双方就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帮助下，1920年5月，陈独秀组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8月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进步青年是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过程中，就注意到从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重要性。于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便立即委

派党小组内最年轻的俞秀松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

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该组织成员包括担任书记的俞秀松及陈望道、叶天底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成立最早，后又积极指导其他地方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并于1921年7月开始代理团中央职权，因此，它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

1920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董必武、谭平山、毛泽东分别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都是秘密的，而青年团的活动却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所以，在本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这些青年团组织成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成员的重要主体，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内外形势交困，1921年5月前后，许多地方的青年团组

织一度出现活动暂停的现象。中共一大会后，中共中央局决定由张太雷等人负责对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整顿和恢复，确定青年团“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随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力量不断增强，各类活动趋于常态化、规范化。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与章程。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摘编自2014年9月18日《中国档案报》，原标题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始末》）



罗亦农：忠实闹革命 愿做急先锋

□ 邢浩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罗亦农在五四运动和进步思想感召下，到上海求学。通过《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杂志，他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并认识了陈独秀等人。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罗亦农进入上海早期共产党党组织举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1921年3月，罗亦农参加了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投入到改造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斗争之中。

1921年5月，他受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派遣，和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罗亦农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使他在政治上迅速地成熟起来。

罗亦农等人是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一届学员，刚开始中国班没有中共党组织，只成立了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党，罗亦农担任支部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冬天，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罗亦农立即由团转党，并被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以后改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3年初，当大批中国革命青年来莫斯科学习时，罗亦农因学习

刻苦，俄文基础好，被推选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书记，专门从事留学生的组织工作，另还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

1924年8月，罗亦农在《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强调：“我们来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为学士、硕士的头衔，以备归国后为进身之阶的，为的是来学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及训练自己成为忠实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1925年，他从苏联回到国内。经过4年锻炼，罗亦农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摘自2016年8月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海外入党不负救国志》）

和阐释的文章越来越多。

傅斯年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北大的精神”。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傅斯年在这里所说的“北大的精神”，并不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而是鲁迅所说的“求新”。

太空在1921年5月4日《晨报》发表的《“五四运动”之回顾》一文中，第一次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精神，他郑重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到底什么？就是发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拿出最大的努力，斩断奴隶索子，打破黑暗势力，创造我们的新生命！

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刊登了汪典存的《每逢五四便伤神》，文中说：“今欲保存五四之精神”，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以忠恕立身忠者为己对人对事具十分热诚而负责任之谓。恕从旧解推己及人之意。二是涵养科学的精神遇事研究，判别是非，具自持不移之态度。

以上说法代表着“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五四精神”的界定和阐释。

（摘编自2017年5月4日《人民政协报》）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 商金林



《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简洁、更清晰、更响亮。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精神”两字，其意义极其深远。

罗家伦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情”的，也是“理智”的；不仅仅是“青年运动”“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折射出来的最可

宝贵的是一种“精神”！

罗家伦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并三呼万岁：“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制裁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编。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时评”栏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五四精神”的這一提法，比罗家伦“‘五四运动’

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学。

张东荪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

神圣的运动和可贵的民族精神

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运动”这个词；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给“五四运动”命名，并且将“运动”提升到“精神”的层面；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给“五四精神”命名。

这三篇文献，前后呼应、各有侧重，又层层深入、开掘提升，其用意显然是要人们感奋起来。从此，“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词镌入史册，“五四运动”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神圣的运动；“五四精神”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这之后，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进行界定

1915年，日本乘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到了1919年，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二十一条”的行动，中国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亲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汇集，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并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一部分学生决议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役见人数过多，立刻关闭大门，此举刺激了前来示威的学生，学生们于是破窗破门而入。

当日，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宅聚会，曹汝霖、陆宗輿二人从后门溜走，章宗祥遭到示威学生的殴打，示威学生在感情奋张之余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大批军警闻讯随即赶来，逮捕学生32人，其中北大被捕学生有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最珍贵的要推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张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

久性与横的扩张性》。这三篇“短评”，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顾兆熊是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他在1919年5月9日《晨报》“评坛”栏发表的这篇名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评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五四”的文献资料。

顾兆熊称5月4日的行为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铲除“旧秩序”与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示威运动”；是“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的“可贵”的“决斗”。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对前途充满憧憬：“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5月26日